

戈振東葡譯本《易經》的翻譯研究

胡婧*

摘要 《易經》作為群經之首，是中國最古老深邃的經典。其語言精練含蓄，具有言、象、意三個方面的內涵，卦爻辭充滿生動的義理闡釋形象。葡萄牙耶穌會士戈振東是第一位將《易經》譯成葡文版本的譯者，對葡萄牙的中國典籍研究和翻譯起到奠基作用。戈氏致力於中葡文化交流，其譯本融合了中西學者的理解與闡釋，帶有文化闡釋的特點。本文旨在發掘戈振東翻譯《易經》的動機，總結他的翻譯思想和翻譯策略，並從文學翻譯的角度對《易經》葡譯本進行評析和解读，探究戈振東對儒家思想的闡釋。

關鍵詞 戈振東；《易經》；翻譯；文化闡釋

一、戈振東神父與中國典籍翻譯

耶穌會士戈振東（Joaquim Guerra, 1908-1993）神父是當代葡萄牙著名漢學家、翻譯家。1908年出生於葡萄牙封當市（Fundão），1928年進入耶穌會，1933年來到澳門，並在澳門神學院教授哲學、文學和數學。戈振東這個名字是上級牧師給他起的，寓意“對東方有益處的人”¹。他曾前往上海神學院學習，並被任命為神父；後又被派往天津，在天津一邊傳教，一邊開始中文拼音的研究。戈振東花了30年創建了一套混合了粵語、漢語、葡語等幾種語言的羅馬拼音系統，方便葡漢雙語轉換，還編著了《漢語字義結構》和《葡中通用詞典》。1951年，戈振東幾經輾轉回到澳門，積極投入教會工作，創建社區中心，開辦學校，並曾任澳門海星中學第一任校長。

在短短十年時間裡，戈振東先後翻譯出版了《詩經》（1979年）、《尚書》（1980年）、《春秋左傳》（1981年）、孔子的四書（1984年）、《孟子》（1984年）、《易經》（1984年）《道德經》

（1987年）和《禮記》（三卷，1987至1988年）。事實上，戈振東的譯本是唯一完整的中國典籍葡語譯本。自十七世紀耶穌會士出版《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以來，部分儒家經典的譯本陸續問世，然而，只有三位漢學家完整翻譯了儒家經典，即倫敦佈道會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法國耶穌會士顧賽芬（Séraphin Couvreur, 1835-1919）和戈振東。

理雅各是著名的翻譯派漢學家，他的譯本《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在1861年至1872年間由牛津大學出版，共五冊，是西方學者的主要參考譯本。理氏譯本被稱為雙語的百科全書，附有許多註釋、介紹性文字和詳盡的索引。儘管戈振東多次反駁並糾正理雅各的翻譯，但他也稱理氏為大師。在表一中，我們將戈振東和理雅各對四書五經的翻譯進行了比較，可以更直觀地感受戈振東在中國典籍譯介方面的成就。

* 胡婧，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葡萄牙語系主任，主持2019年天津市哲學社科規劃課題“澳門土生文學中國形象的構建和文化隱喻”和2020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澳門通史：從遠古至2019年》葡文版”。



表一. 戈振東與理雅各的譯本比較

經典	戈振東譯本	理雅各譯本
《大學》	"A Grande Escola (Thaey-Háog)" in <i>Quadrivolume de Confúcio</i> , Macau, 1984.	<i>The Great Learning (Ta Hsüeh)</i> <i>The Chinese Classics</i> , vol. 1, Hong Kong, 1861 (2nd Ed. 1893).
《中庸》	"A Harmonia Perfeita (Tyoq-loq)" in <i>Quadrivolume de Confúcio</i> , Macau, 1984.	<i>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Chung Yung)</i> <i>The Chinese Classics</i> , vol. 1, Hong Kong, 1861 (2nd Ed. 1893).
《論語》	"Diálogos (Lwn-Gnuh)" in <i>Quadrivolume de Confúcio</i> , Macau, 1984.	<i>Confucian Analects (Lun Yü)</i> <i>The Chinese Classics</i> , vol. 1, Hong Kong, 1861 (2nd Ed. 1893).
《孟子》	<i>As Obras de Mêncio (Mătsi)</i> , Macau, 1984.	<i>The Works of Mencius (Mencius)</i> <i>The Chinese Classics</i> , vol. 2, Hong Kong, 1861 (2nd Ed. 1895).
《詩經》	<i>O Livro dos Cantares (She-Keq)</i> , Macau, 1979.	<i>The Shi King or The Book of Poetry</i> <i>The Chinese Classics</i> , vol. 4, Hong Kong, 1871. <i>Sacred Books of the East</i> , vol. 3, Oxford, 1879.
《尚書》	<i>Escrituras Selectas (Zhyăw-Shue)</i> , Macau, 1980.	<i>The Shoo King or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i> <i>The Chinese Classics</i> , vol. 3, Hong Kong, 1861 (2 parts). <i>Sacred Books of the East</i> , vol. 3, Oxford, 1879.
《春秋》	<i>Quadras de Lu e Relação Auxiliar (Tjhon-Tsheq)</i> , Macau, 1981-1983 (5 volumes).	<i>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i> <i>The Chinese Classics</i> , vol. 5 (2 parts), Hong Kong, 1872.
《易經》	<i>O Livro das Mutações (Yeq-Keq)</i> , Macau, 1984.	<i>The Yi King or The Book of Changes</i> <i>Sacred Books of the East</i> , vol. 16, Oxford, 1882.
《禮記》	<i>Cerimonial (Lei-Ky)</i> , Macau, 1987-1988 (3 volumes).	<i>The Lî Kî or Collection of Treatises on the Rules of Property or Ceremonial Usages</i> <i>Sacred Books of the East</i> , vol. 27&28, Oxford, 1885.

戈振東翻譯中國古籍的熱情，首先來自於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和對中國所懷的敬意。他在《尚書》的譯本序言中說：“中國是一個奇跡，只有對這個國家一無所知的人才會在她面前無動於衷。”²他認為中國漫長而燦爛的歷史“反映出中國人的非凡的生命力和人文精神”³。中國文化是一個豐富寶庫，應該讓全世界的人民

來分享，“中國於西元前數百年問世的四書五經，是一直啟發和指引中國人心靈的學說，中國應該繼承這些學說，以保持自身的純粹，保證國家的延續，維護國家的尊嚴和榮譽。不過其他國家，無論遠近，都可以從這些學說中汲取教益”⁴。

易經研究

《易經》是中國最古老的文獻之一，被儒家尊為“五經”之首。儒家、道家、兵家、農家、醫家、法家、雜家等無不將《易經》思想收納於其理論、思想之中。所以說，《易經》思想貫穿於中國古代所有文化之中，是中國文化的源頭和樞紐。早在十七世紀，西方來華傳教士就開始了《易經》等中國典籍的譯介。西方最早的《易經》譯本是拉丁文譯本，該譯本於1626年刊印，是由利瑪竇的弟子、法籍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所譯。在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的德譯本問世前，理雅各於1882年出版的英譯本一直是西方研讀《易經》的理想藍本，戈振東也將此作為主要參考譯本，而戈氏的葡文譯本在1983年才問世，比理雅各晚了一百年。

二、戈振東葡譯《易經》的翻譯思想和策略

對於《易經》的翻譯，不同的譯者基於不同的目的，就會有不同的翻譯思想和翻譯策略。理雅各的翻譯目標是為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服務，使西方人能夠通過他的典籍翻譯了解中國，所以他採用了異化法，在譯文中盡可能地保持漢語原文的語序結構。如果說理氏譯本是為了表現原著所說，那麼衛禮賢的德譯本則是將《易經》作為中國哲學思想的經典對待。衛禮賢尤其注重對《易經》的系統理解和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正確詮釋，因此他使用了歸化法，對很多有歧義的卦爻辭做了註解和重譯，使譯文能夠體現原文的精神實質。

至於戈振東翻譯《易經》的緣起，他在譯本的序言中說道：“也許是利瑪竇誕辰400週年紀念日帶給我的啟發，也許是他在肇慶進行的第一個傳教任務給我的感召，在我12歲時傳教也成了我的任務，我將此譯本獻給傳教之路上的先驅——利瑪竇神父。”⁵他承認：“翻譯《易經》原不在我的計劃內，但當我意識到這部典籍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以及孔子本人對它的重視時，我就決定做這項工作。”⁶

戈振東是利瑪竇的推崇者，因此與理雅各和衛禮賢不同，他並未遵循新儒家學派的解釋模式，即以程頤、朱熹的註疏為依據。他的譯本體現了十七至十八世紀《易經》在西方傳播初期的特點，即耶穌會士試圖恢復原始儒學，並在儒家思想中尋找與基督教教義的各種調和點。他不僅對理氏譯本提出批評，還對民國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和二十世紀西方漢學家的不可知論的闡釋進行批判。對戈振東來說，此次翻譯工作是一次機會，“去糾正大量已流傳幾百年的、嚴重扭曲文本原意的譯文或解釋。”⁷

戈振東葡譯《易經》的翻譯思想可以歸結為“以忠實原著為前提，以接近讀者為目標”。《易經》的語言凝練晦澀，戈振東把“可理解性”定為翻譯目標，希望為葡語讀者提供自然流暢的譯文，使讀者通過查閱他的葡譯文就能對《易經》的晦澀理論有所理解。

以《乾》卦卦辭“元亨利貞”為例，眾多西方學者的翻譯版本會用形容詞分別解釋這四個字，如理雅各譯為“great and originating, penetrating, profitable and steadfast”⁸（偉大的、原始的、有益的、持久的），以期考索源流、體現本義；戈振東的譯本則是用“Um êxito inicial ajuda à constância”⁹（初期的成功有助於恒久）這個完整的句子來體現乾卦的奧秘。總體來說，戈氏的譯本既含有對字的解釋：元即為初期的，亨為成功，利即有利於，貞則是恒久，同時，譯文簡潔明瞭，準確傳達了原文資訊，可理解性強；而理雅各的譯本，戈振東的評價為“Eu acho que isto não é tradução, mas um amontoado de palavras”¹⁰（本人不認為這是翻譯，只是詞的堆砌）。

戈振東葡譯《易經》的翻譯策略則可以概括為歸化法和釋義法。在翻譯技巧方面，戈振東使用了增詞、省略、轉換、詞序調整等技巧。以《蒙》卦九二爻為例：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¹¹

戈振東譯文：

Tereis a família nas mãos: mediante uma combinação de dureza e brandura.¹² (筆者譯：你將擁有一個家庭：通過堅強與溫柔的結合。)

象辭的意思是兒子持家，是剛爻和柔爻相接的緣故。在此句譯文中，戈氏使用了詞性轉換、增詞的技巧，這裡的“剛”和“柔”是指九二、六三兩個相近的陰陽爻位，戈振東從這方面評述可以加強讀者對原文的理解。

戈振東譯本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在每爻的譯文後都會加長篇批註，將自己的譯文與理氏譯文並置比較以評說優劣。戈振東在後記中將自己與理雅各對《說卦》的翻譯做了對比，並指出了自己翻譯的原則。

《說卦》開篇有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¹³ 理雅各譯為：

Anciently when the sages made the Yi, in order to give mysterious assistance to the spiritual intelligences, they produced (the rules for the use of) the divining plant.¹⁴ (筆者譯：古時先哲創作《易》時，為了給精神智慧提供神秘的幫助，他們使用規則創造了占卜植物。)

戈振東說，“理雅各在註釋中提到，他將文本中的聖人理解為單數形式，而這是我的翻譯方式，‘Outrora, os Santos, ao inventarem as Mutações, colaboraram misteriosamente com a Inteligência divina, e assim cultivaram a aquileia da divinação’”¹⁵。第五章中的“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¹⁶，理雅各譯為：

The sages turn their faces to the south, when they give audience to all under sky, administering government towards the region of brightness.¹⁷
(筆者譯：聖人們將他們的臉轉向南方，當他們傾聽天空下的所有人時，他們朝着光明之地實行統治。)

戈振東稱：“我譯為‘O Santo é de cara ao sul que escuta e atende o mundo: Governa virado à luz’。長期以來，此文都是按字面意思來解釋的，於是被譯為古聖先王坐北朝南。但按照合理邏輯看，當時聖人並不在國家北方。我之前講過，南面可能有另一種解釋：南也指君主、皇帝，因此，‘南面’可以指君主的臉色或態度。”¹⁸ 所以在戈氏第六章的開篇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¹⁹，理雅各譯為“‘When we speak of Spirit, we mean the subtle (Presence and operation of God) with all things’”²⁰ (當我們談到聖靈時，我們指的是萬物的微妙之處，即神的同在和運行)。戈振東認為，理雅各的版本是有缺陷的，他改動了“言”字的位置，而且運用括弧進行註釋的內容不明晰。戈氏的譯版本是“O Espírito penetra e enche todas as coisas, e fala”²¹ (聖靈滲透和充滿萬物，並發聲)，這段文字讓人想起《所羅門智訓》中的一段話：“上主的神充滿了世界，包羅萬象，通曉一切語言。”²²

戈振東選擇這樣的譯文文本是耐人尋味的。英國學者西奧·赫爾曼斯 (Theo Hermans) 在談到譯者身份時提到，作為譯者“必須說話，但不能發出聲音”²³。從譯者慣習看，戈振東是一個具有強烈宗教使命感的人，希望可以通過各種方式來傳播他的信仰，因此他的翻譯也會不由自主地受到這種主觀因素的影響，讓他的譯本多少會帶有這種基督化的宗教色彩。雖然戈振東主張譯者應該服從原文，而不是讓原文服從自己的觀點，但他將中國典籍視為充滿智慧的書，認為“Pois só assim se pode esperar atingir o original”²⁴ (沒

易經研究

有體會精神，豈能領悟其中真意？），那麼，從這樣的角度去翻譯《易經》時，戈氏的闡釋一部分超出翻譯的界限，成為廣義上的文化翻譯或轉述，翻譯的忠實標準也繼而成為相對的標準。

儘管如此，戈振東對《易經》的研究還是學術化和專業化的，並在客觀上推動了葡萄牙漢學的發展。他不僅注重字義和文義，了解成書年代和作者問題，而且還在前言、註釋、後記等副文本裡進行介紹和評述，也對前人的譯本進行了翻譯批評。

從戈振東葡譯《易經》的體例和內容看，它的第一部分是序言，第二部分是前言，第三部分則是經和傳，標題為“周文王的六十四卦”。戈振東主張經傳不分離，每卦的翻譯都是卦相、彖文和象文。他提倡並在譯本中使用的卦序是坤、艮、坎、巽、震、離、兌、乾，“正好是先天八卦相反的順序”²⁵，是從陰到陽的陽升排序。傳分為四部分，分別是對《繫辭》《說卦傳》《序卦》《雜卦》的翻譯。第四部分是附錄，第五部分是參考書目。全書共計 861 頁，正文採用橫排版式，每頁左側印有中文原文和自創的中文拼音，右側是葡語譯文。譯本也符合《易經》原意義的系統：卦辭、爻辭為第一意義系統；《彖》《象》《文言》作為第二意義系統，其譯文出現在每卦的爻辭之後；《說卦傳》《序卦》《雜卦》和《繫辭》為第三意義系統，其譯文作為單獨章節，出現在經文之後。

三、戈振東葡譯本《易經》的文化闡釋

（一）戈振東葡譯《易經》的言簡意賅

《易經》中的詞彙簡潔凝練、內涵豐富、富有表現力。以《離》卦九四爻為例，“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²⁶。戈振東譯文：

Apareceu de repente: como o incêndio, como a morte, como o que

se deita fora.²⁷（筆者譯：突然地出現了：似火，似死亡，似丟棄之物。）

此爻用詞極簡，說的是災難突然而來，似烈火燃燒，但頃刻間又煙消雲散、不復存在。詞尾重複出現的“如”字是結構助詞，相當於“然”，指某種樣子或狀態。通過對戈振東譯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戈氏的句式與原文完全一致，既能有效地表現出句子的節奏，又使前後句緊密相連。

再以《鼎》卦九三爻為例，“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²⁸。戈振東譯文為：

As asas do caldeirão quebraram-se, o que impede a sua deslocação. Não se comerá a gordura do faisão. Mas uma chuva oportuna veio dissipar os cuidados. Afinal acabou bem.²⁹（筆者譯：鼎耳折斷了，這使它無法移動，人們無法吃到野雞的肥肉，但一場及時雨已來驅散憂慮。結果還是不錯的。）

理氏的譯文為：

The third line, undivided, shows the caldron with (the place of) its ears changed. The progress (of its subject) is (thus) stopped. The fat flesh of the pheasant (which is in the caldron) will not be eaten. But the (genial) rain will come, and the grounds for repentance will disappear. There will be good fortune in the end.³⁰（筆者譯：第三行線，未分開，顯示的是坩堝鼎耳的位置改變了。主體的進展因此停止。鍋裡雉雞的肥肉不會被吃掉。但是和煦的雨會來，懊悔的理由會消失。最後會有好運的。）

爻辭的意思是鼎器的耳部掉了，移動鼎有困難，裡面的山雞肉也吃不上了，剛好陰陽調和的雨出現，才使悔恨漸消，最終吉祥。原文一共 16 個字，兩對三言句和四言句簡潔明瞭。理雅各的譯文雖語法嚴謹，選詞考究，但增添了解釋性的長段文字。相比下，戈振東的譯文簡潔有序，同時也未省略原文的內容和內涵，基本忠實地反映了原文的意思。

《易經》卦爻辭裡還有很多疊音詞的使用。如《乾》卦九三爻“君子終日乾乾……”³¹就採用了疊詞的修辭手法，“乾乾”生動地刻畫了君子自強不息、勤勉事事的聖人形象。理雅各的譯本是：“In the third nine, undivided, (we see its subject as) the superior man active and vigilant all the day ...”³²（在九三爻中，未分開，我們將其主體視為君子一整天都很活躍和謹慎），理氏用爻位作主語，在括弧中增補了原文中沒有表達的隱含意義，將爻辭用一個定語從句譯出，規範而嚴謹，但顯得冗長而又呆板，與《易經》簡潔的風格不符。反觀戈振東的譯本，“o Sábio, diligente o dia inteiro...”³³（智者終日勤奮），以同位語短語修飾主語，簡潔明瞭，亦忠實原文。

（二）戈振東葡譯《易經》的象徵意蘊

以《漸》卦前三爻為例。《漸》卦從初六到上九的爻辭向我們展示了這樣一幅場景：大雁自水中游向了岸邊，飛翔在大石之上，徊復於高地之間，棲息在樹林上，又往來於平地和大山之際。這種悠然的快樂也喻示着包括嫁娶在內的各種民俗之事的線性發展，是一幅優美圖畫，各分場景之間又有時間的發展邏輯。通篇使用了“賦、比、興”三法則之“興”法則，以鴻雁起興，形式上形成前後音韻的聯繫。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³⁴ 戈振東譯文：

Linha do fundo, traçada. Os patos

bravos atravessam para a margem. Os filhos novos corrigem-se, mas com bons modos, e não haverá mal.³⁵（筆者譯：最下層線，分開。野鴨向岸邊游去。年輕的孩子被糾正，但卻以溫和的方式，這樣不會有甚麼危險。）

“鴻”，水鳥名，即大雁；“干”指的是水畔；老師稱弟子可為“小子”，這裡指與大人相對的小孩、青年人；“有言”是指受言語中傷，被人責難。《象》中這樣解釋本爻：“小子之厲，義无咎也。”³⁶也就是說年輕人雖遭“厲”“有言”，終獲“无咎”，不會發生甚麼危險。

《漸》卦多用象徵比喻。初六軟弱，不具備一飛衝天的條件，像大雁漸漸飛到了河岸邊，所進尚淺，像年輕人蒙受語言中傷，如果能漸進不躁，可以免除災難。這一爻是說，凡事得一步一步來，不可太勉強，否則反而招惹是非。在譯文中，理雅各將“小子”理解為“A young officer”（年輕的軍官）是不準確的，而戈振東採用了“Os filhos novos”（年輕的孩子）更為妥當。對於“厲”和“有言”的翻譯，理雅各採用了“be in a position of danger”（處在危險中）和“be spoken against”（被反對），雖不夠準確，但意義接近原文；而戈振東譯為“corrigem-se, mas com bons modos”³⁷（被糾正，但卻以溫和的方式），雖然沒有將“厲”和“有言”在該爻中的特殊含義翻譯出來，但也沒有偏離原文本意，以平白的語言體現該爻的意蘊。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³⁸ 戈振東譯文：

Linha 2, traçada. Os patos vão para o prado, onde se alimentam satisfeitos.³⁹（筆者譯：第二行線，分開。野鴨前往牧場，在那裡滿足地覓食）

“磐”指磐石，“衎衎”形容和樂愉快的氣氛。到了六二爻，大雁又飛高了一層，已經從河岸

易經研究

漸漸地升進聚集到磐石上，作起程前最後的準備，一起安享飲食，吉祥。

磐石指厚而大的石頭，因此，理雅各譯成了“large rock”。而帛書中“磐”作“坂”，即“阪”，指的是山坡。⁴⁰無論該爻取巨石之意還是山坡之意，既然主語是“鴻”，那麼“飲食”之地應該是大雁飲食之地，因此，戈振東譯為“o prado”（牧場、草原），從文化闡釋層面看，是符合大雁飲食之地這層原意的。但是，戈振東的譯文中沒有體現對占斷辭“吉”的理解，他以“onde se alimentam satisfeitos”結尾，意思是他們在那裡滿足地覓食。此爻是說，人們看到鴻雁飛向山坡時，因坡上種滿了鬱鬱蔥蔥的莊稼，從而聯想到今年將會有好的收成，人們會飲食無憂，故吉。象辭對爻辭進一步發揮，提出“不素飽也”的觀點，也就是說不只為吃飽飯，是由象比類而繫之辭。可見，此爻沒有遵循邏輯推理之路，也沒有直接定義，而是通過建立兩種不同事物間“意象”的隱喻關係，巧妙地揭示事物的本質特徵。這種文化隱喻在《易經》經常出現，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戈振東的譯本對文化隱喻的翻譯仍然不夠充分。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⁴¹戈振東譯文：

Linha 3, inteira. Vão os patos pelo caminho adiante. O marido foi na expedição e não voltou. A mulher concebeu. Mau é isso. É preciso resistir à violência.⁴²（筆者譯：第三行線，未分開。鴨子沿路向前。她丈夫去遠征沒有回來，女人懷孕了，那太糟糕了，必須抵制暴力。）

“陸”指高的平地，“復”指復還，而“孕”，劉大鈞在《今、帛、竹本〈周易〉綜考》中提到，帛本作“繩”⁴³。本爻的意思是大雁漸漸飛到高高的平地上，丈夫出征沒有回來，婦女雖已懷孕，但因戰亂，或終不得生育或養育，兇險，

但有利於抗擊盜寇。象辭說“利用禦寇，順相保也”⁴⁴，利於抗擊盜寇，是因為民眾和順相處共同保衛家園。此卦有漸近之意。

在戈振東的翻譯中，“陸”被譯成了“caminho adiante”（前路），相對於理雅各的“dry plains”（乾燥的平地），似乎含義更為模糊，兩者的翻譯都沒有體現出“陸”之所指。然而本卦和本爻辭所取之象是道路，由通向遠方的道路聯想到丈夫出征。因此，從文化闡釋的角度看，戈振東的翻譯是反映了本爻的意蘊的。只是，對“婦孕不育”，戈振東譯為“A mulher concebeu”（女人懷孕了），僅包含了原文的部分含義，沒有對“不育”的具體含義作出解釋。婦人雖在丈夫出征前已有身孕，但身處亂世，恐獨自難以支撐，無力生育或養育小孩，故凶。但是，戈振東在譯文中還是體現了對占斷辭“凶”的理解，即“Mau é isso”（那太糟糕了）。

吳鈞從文學和文學翻譯角度出發，認為“《易經》具有言、象、意三個方面的內涵：它的卦爻辭充滿着旋律美；它的選詞用句精練含蓄，內涵豐富；它的義理闡釋形象生動，其寓意故事栩栩如生”⁴⁵。從形式來看，戈振東用葡文“linha do fundo”（最下層線）或阿拉伯數字（如2、3、4）指明爻位，同時用“traçada”（指分開的）和“inteira”（指未分開的）來表明是陽爻還是陰爻。《漸》卦內含的古詩採用了二言、三言、四言句，理雅各的譯文語法嚴謹、用詞準確，但缺少短詩的韻律；而戈振東的翻譯更為言簡意賅，沒有使用形合的葡語複句，也沒有採用解說式的翻譯，從體裁來看，戈氏譯本較理氏譯本更符合詩歌體裁，但仍未充分體現其意蘊。

（三）戈振東葡譯《易經》對爭議性問題的處理

首先，是對關鍵性術語的翻譯。戈氏譯本完成前，書名和卦名沒有一個標準的翻譯方法，這必須由他解決。澳門史學家文德泉（Manuel

Teixeira, 1912-2003) 神父在給戈振東的信中說道：“請以你罕見的才能繼續翻譯中國典籍，就像理雅各一樣，因為這個主題還未有任何葡語譯著。”⁴⁶ 有學者認為，對典籍中重要概念的翻譯，不能只孤立於某個詞、片語、句子進行分析，而必須從詞源、文本、歷史語境和譯文語境等方面進行深入研究，毫無疑問，這也是翻譯的難點所在。

以“亨”字為例，這個核心詞彙在《易經》中一共出現了47次。在傳統經學中，“亨”通常釋為“順利、通達”，早期的西方譯者亦多採此意。高亨在《周易大傳今註》裡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解釋：“元大也。亨即享字。古人舉行大享之祭，曾筮遇此卦，故記之曰元亨。”⁴⁷ 亨和享，原為同一個字的異體，所以許多新易學家都是圍繞着“祭祀”這一方向進行解讀的。

以《遁》卦中“遁亨”為例。卦辭寫“遯”，本義是逃跑、逃避，引申義為隱遁、躲避，講的是一種以退為進的智慧。亨字一方面表示對卦辭的肯定，另一方面表示內容的延伸：實力懸殊時就撤退（遁），才能保存實力（亨）。《周易》創作於商周即將觸發戰爭的前夜，周文王又被商紂王拘禁，卦辭是指導周國臣屬如何發展自己、消滅敵人的。戈振東的譯文是：“Retirar-se é propício”⁴⁸（撤退是合適的），可以看出，這是結合了語言環境和時代背景的，但沒有做到探本溯源。

其次，是對一般性爭議問題的理解。這些問題一類是由於對經文或舊註的誤解，另一類是由於接受註釋中的錯誤而造成的重複誤解。《易經》原文本身很難理解，戈振東在理解原文或註釋的語言時難免有失誤，也有可能接受中西方學者的一些錯誤註釋。

以《師》卦為例，“師，貞，丈人，吉无咎。”⁴⁹ 戈氏在翻譯“師”這一術語時，首先採用音譯方法，將“師卦”譯為“Prognóstico de SJE”⁵⁰（《師》的預卜），之後能夠兼用意譯的方法，在括弧中譯出“師”的含義，

“Exército”⁵¹（軍隊）；“貞”在眾多易學思想中被理解為“正”或“正固”，即堅守正道，能統領大眾於正道就可以興旺了，對此，戈振東譯成了“dá certo”⁵²（成功），是有待進一步推敲的；六三和六五兩爻中的“輿尸”，“輿”是始見戰國的文字，指的是“以車運載”，“尸”讀為“屍”，表示“筮遇此爻，軍隊出征，或載屍而歸，是凶也”⁵³之意，然而，戈振東將其譯為“Se o exército tem vários Chefes”⁵⁴（如果軍隊有幾個首領）和“outros Oficiais mais novos tomam parte do comando”⁵⁵（其他年輕軍官接管指揮權），明顯受到了理氏譯本“the host may, possibly, have many inefficient leaders”⁵⁶（軍隊可能有許多低效的首領）和“younger men (idly occupy offices assigned to them)”⁵⁷（年輕軍官無所事事地佔據分配給他們的崗位）的影響，沒有將“輿尸”的意思準確譯出。

最後，翻譯在語言的表達上沒有“絕對的等值”，只有“相對的等值”。《易經》常被視為中國古代詩歌之起源，卦爻辭中引用了很多謠諺古歌，充滿詩性智慧與文字之美，這就涉及到了詩歌語言的“不可譯”性。以《无妄》卦六三爻為例：“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⁵⁸ 它似一首寓言詩，意思是意想不到的災難，就好比有人繫牛於此，被路過的人牽走了佔為己有，村裡的人卻因此遭到了懷疑。戈振東譯文：“Infortúnio de quem não foi insensato: Alguém prendeu um boi. Outro passou e levou-o: Infortúnio para a gente da terra”⁵⁹（明智的人的不幸：有人栓了一頭牛。另一個人路過並帶走了牛：為這片土地的人們招致不幸），意思準確清晰，在字詞、句子上有比較相等的配合。但遺憾的是，戈氏的譯文未能與原四言詩句在句子構造和語意上對等。

綜上，學界迄今為止對《易經》及其翻譯研究多集中在英譯、法譯、德譯和拉丁語版本上，葡語譯本在學術研究範疇仍屬空白，因此，

易經研究

對耶穌會士戈振東神父《易經》葡譯本的研究在探討中葡文化交流的發展和翻譯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價值。

本文通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戈振東在翻譯中體現出他對溝通中葡文化的努力和追求，主張忠實原文，關注語言、風格、文化等不同維度，戈氏譯本在語意表達上基本與原本相符合；第二，戈氏對儒家思想的闡釋方面仍有不足之處，用語比較平白，有散文化傾向，未能充分體現《易經》中詩歌體裁的意蘊；第三，由於沒有其他葡萄牙語譯本可供比較，戈氏譯本的翻譯參考略顯不足；第四，儘管戈氏在翻譯方法和翻譯技巧上仍有值得商榷之處，但鑑於他對中國哲學思想的認知，其譯本詮釋可以幫助葡語讀者了解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智慧。

戈振東作為首位以葡萄牙語翻譯《易經》的譯者，對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特別是中葡文化交流有不可替代的貢獻。戈氏特殊的文化背景，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熱愛，以及他對中國典籍的精通使我們進一步了解了“文化他者”是如何接受不同文化的。研究戈氏葡譯譯本，實際上也是對中葡兩種文化不同思維模式和文化特徵的並置比較，為我們在中葡跨文化研究領域提供了範本。

附：本文為 2019 年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澳門土生文學中國形象的構建和文化隱喻”（項目編號：TJWWQN9-0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註釋：

1. Antonio José Bezerra de Menezes Jr., *Joaquim Guerra S. J. (1908-1993): Releitura Universalizante dos Clássicos Chineses*, Tese de doutoramento, São Paulo: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2013, p. 41.
2. “A China é um prodígio, que só não assombra a quem o não conhece”, 詳見 [葡] 戈振東：《尚書》（*Escrituras Selecta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0 年，第 19 頁。
3. “Nela se revela a excepcional vitalidade do povo chinês e o seu humanismo”，詳見 [葡] 戈振東：《尚書》（*Escrituras Selecta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0 年，第 19 頁。
4. Joaquim Guerra, “Os Clássicos Chineses vertidos em português —um trabalho de base”, *Estudos Portugueses e Africanos*, Campinas: UNICAMP-IEL, no. 11, 1º semestre de 1988, pp. 93-94.
5. [葡] 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3 年，第 25 頁。
6. O livro da Mudança fica a ser a 3.ª obra sob a epígrafe “NA ESCOLA de CONFÚCIO”, sendo a 1.ª o Quadrivolume de Confúcio (Diálogos, Frande Escola, Harmognia Perfeita, Manual da Piedade), e a 2.ª o livro de Mêncio (Mêncio). 參見 [葡] 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3 年，第 81 頁。
7. [葡] 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 年，第 81 頁。
8. [英] 理雅各譯，馬吉照校註：《英漢雙語國學經典：易經》，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3 頁。
9. [葡] 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 年，第 651 頁。
10. [葡] 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 年，第 667 頁。
11. [葡] 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 年，第 280 頁。
12. [葡] 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 年，第 279 頁。
13. [魏] 王弼、[晉] 韓康伯註，[唐] 孔穎達疏，鄭同整理：《周易正義》，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 年，第 323 頁。
14. [葡] 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 年，第 837 頁。
15. [葡] 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3 年，第 837 頁。

16. [魏]王弼、[晉]韓康伯註，[唐]孔穎達疏，鄭同整理：《周易正義》，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327頁。
17.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838–839頁。
18.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839頁。
19. [魏]王弼、[晉]韓康伯註，[唐]孔穎達疏，鄭同整理：《周易正義》，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328頁。
20.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839頁。
21.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839頁。
22. [以]所羅門：《所羅門王大智慧書》，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19頁。
23. 西奧·赫爾曼（Theo Hermans）於2018年6月5日在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舉辦題為“Positioning Translators”（譯者的定位）學術講座時提到。
24. [葡]戈振東譯：《道德經》（*A Prática da Perfeição*），澳門：澳門耶穌會，1987年，第43頁。
25.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33–34頁。
26.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502頁。
27.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503頁。
28.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566頁。
29.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565頁。
30. [英]理雅各譯，馬吉照校註：《英漢雙語國學經典：易經》，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55頁。
31.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650頁。
32. [英]理雅各譯，馬吉照校註：《英漢雙語國學經典：易經》，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頁。
33.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651頁。
34.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436頁。
35.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435頁。
36.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436頁。
37.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438頁。
38.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438頁。
39.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435頁。
40.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釋文）》，載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52頁。
41.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438頁。
42.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437頁。
43. 劉大鈞：《今、帛、竹本〈周易〉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頁。
44. 高永平：《圖解易經》，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年，第437頁。
45. 吳鈞：《論〈易經〉的語言特色及其英譯策略》，《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5月第33–3期，第88頁。
46. Joaquim Guerra, *O Livro dos Cantares* (edição revisada), Maca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Hong Kong: Aidan Publicities & Printing, 1990, p. 20.
47. 高亨：《周易大傳今註》，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第161頁。
48.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447頁。
49.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238頁。
50.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239頁。
51.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239頁。
52.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239頁。
53. 高亨：《周易大傳今註》，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第94頁。
54. [葡]戈振東譯：《易經》（*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241頁。

易經研究

55. [葡] 戈振東譯：《易經》 (*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241頁。
56. [英] 理雅各譯，馬吉照校註：《英漢雙語國學經典：易經》，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頁。
57. [葡] 戈振東譯：《易經》 (*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245頁。
58. [葡] 戈振東譯：《易經》 (*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234頁。
59. [葡] 戈振東譯：《易經》 (*O Livro das Mutações*)，澳門：澳門耶穌會，1984年，第231頁。



